

是强行将它剥了下来。然后，对她进行蒙眼，堵嘴，反剪双手捆绑。在这个过程中，特务趁机对毛英才同志进行侮辱。毛英才同志怒不可遏，以跳摆脱，以骂反抗。特务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将她打昏在地。然后，把她扔上了刑车。当刑车开到刑场附近停下后，特务们第一个把毛英才同志连推带拖地弄下车来，然后由两个特务分左右架着她的胳膊，强拉硬拖，大步跑向刑场。开始，毛英才同志尚能挣扎，与敌人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但由于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很快就体力不支，失去了反抗的力气。她浑身疲软，搭拉着脑袋，呻吟着，但是她那双愤怒的眼睛却一直瞪着特务那狰狞的嘴脸。后来，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似乎处于昏迷的状态。在经过一条小沟的时候，毛英才同志脚上的皮鞋被拖掉了一只。就这样，毛英才同志只穿着一只鞋，就惨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新社会制度的诞生，毛英才同志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她刚刚二十四岁。

流芳百世 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根据毛英才同志在狱中的表现，也根据她所表示的以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为荣的愿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特意追认她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为了广扬她的事迹，恢弘她为革命坚贞不屈和献身精神，激励中国民主同盟广大盟员以及它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中国民主同

盟中央委员会编辑的《中央盟讯》，在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的《缅怀先烈 奋进不息》栏目中，专门介绍了毛英才同志的事迹。

为了纪念和学习毛英才同志，而今的华西医科大学的校园里，耸立着毛英才同志的塑像。她向人们亲切地微笑着，欣慰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事业兴旺发达。她向人们召唤着，呼唤人们踏着烈士的足迹，发揚烈士的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屈不挠，矢志不渝，披荆斩棘，努力向前。

现在，毛英才同志静静地躺卧在成都市青羊宫烈士陵园里。与她作伴的，除了有与她同天遇难的其他三十一位烈士外，还有十二月四日晚在成都王建墓内遇害的另外三位烈士，还有周从化烈士。他们的周围，绿草如茵，植满了花，拱卫着柏。毛英才同志虽然牺牲快四十年了，然而，她追求的事业，正象她那陵墓周围的鲜花一样，吐艳，怒放。她的事迹，她的名字，她的精神，犹如她陵墓周围的翠柏，四季青长，永不衰老。

（本文根据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本盟死难同志调查表》及其它有关材料和《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编写）



革命青年張大成

张大昌

我的胞弟张大成烈士，一九二〇年农历八月八日生于四川省郫县德源乡义林村。我们家庭贫苦，世代以耕田地为生。父亲张致祥，民国初年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堂。他先后在乡村私塾和郫县县立小学教书四十余年，直至解放。母亲税氏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因全家食口八人，生活困难，大哥高小毕业后便在家务农；大成在义林寺初小毕业后，也輟学种田。那时，只有我一个继续上大学，也只能读半公费的工科。大成到十二岁时的体格，已同成年人，十三岁起就学会栽秧、播种，就能使牛踏耙，犁田、耙田、磙田，平田都行，成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之一。他还自有生活乐趣，最喜欢养鸽子，家里喂的鸡、鸭、狗等都是他管。

大成弟自幼受到家庭的教育影响，养成了秉性正直、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的性格。一九三五年夏，温江专署的保安团队到义林寺一带“清乡”，趁机搶掠农家的鸡鸭等财物，还美其名“借用”。在他们的刀枪淫威下，农民敢怒而不敢言。一日，年刚十四岁多的大成，遇見这伙恶兵凶徒搶劫了农民财物上路时，当即怒斥他们行为不当。他们恼羞成怒，

立即用拳、脚和枪托交替毒打大成，打得他血迹斑斑，遍体鳞伤，肋骨、腰肾都受到折损，疼痛难忍，直到昏倒在地，还骂他“管闲事”方才罢手。经家人将他扶救回家，治疗了三年多还不得痊愈，以致不能再承担稍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了。这使他对恶势力更加恨之入骨。

由于大成已基本丧失劳动力，父母兄弟才不得不省吃俭用，积攒出学费，让他去读书。一九三八年，大成已到十八岁，才去何家场小学读高小。一年后，考入郫县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全公费的省立成都师范学校。一九四四年，大成即以师范肄业生考入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系，第二年转农艺系。因他学习成绩优良，常获公费补助，得以完成大学学业。

一九四三年，曾任四川省团练总局局长的地主胡巨川，借口我家过去所缴的租地押金是法币，现在法币贬值了，要将原来每亩六十元的押金提高，加为二百元。我哥哥张文著向他据理力争说，原来缴押金时的法币，是一元值银币一元，为什么还要增加！虽然问得他理屈词穷，但他倚势压人，反而打了我哥哥两耳光。这个恶霸地主能通官府，有权势，我家暂时对他莫可奈何，但我们兄弟都有誓报此仇的决心。在外读书的大成闻之，尤为愤怒。

大成在读师范和大学几年中，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一九四三至四五年时，我常由重庆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邮寄回家，供大成、大哥和他们联系的群众传阅。在此基础上，我们于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在郫县组织有青年三十余人的读书会，积极学习《中共七大文献》和一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史历唯物主义观而撰写的哲学、政治经济

学、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文章著作，从而使大家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形势有了較正确的认识。大成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进步較快。

特别是大成肄业四川大学时，（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正值国民党政府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他对这些反动行径，愈来愈愤慨，日益更多地投入中共地下党发动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如声援昆明血案，反对中美商约，反对美军暴行，声援沈崇事件，反飢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等等。革命群众运动的教育、鍛炼和进步同学的启发帮助，使大成的革命思想逐渐树立起来，认识到不打倒蔣政权，中国就没有光明前途可言。他的斗争意志变得很坚决，行动表现非常积极。

当时，四川大学有許多进步学术团体，是进步学生交流学术，研讨时事政治和进行民主运动的活动场所。大成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社和时事研导社。他在一九四八年夏，担任了时事研导社社长。“时研社”积极参加地下学联（校内所有进步学术团体的秘密联合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以占领我党在学运方面的领导阵地；组织时事座谈，办墙报刊物，以唤醒群众；揭露批判国民党出卖祖国主权、屠杀人民、施行内战禍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凡是开辩论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积极分子。

一九四六年夏，大成经张万祿、刘光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他的二哥（即我）因参加了民盟和民主运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他不但沒有被吓倒，反而同大哥文著几次去向民盟四川省和成都市负责人张

志和、张万禄汇报和请示工作，并把我在郫县组织、发展的民盟小组和读书会的活动继续推动发展起来。

一九四九年冬，成都市参議会员、民社党党员官箴予和恶霸袍哥头子徐子昌参加竞选所谓国民大会代表。“官大炮”为了多拉选票，在发表竞选演说中，对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了一些指责。四川省政府即以“煽惑群众”、“詆毀官府”的罪名，把他秘密逮捕，关进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这虽是狗咬狗的事件，但却戳穿了国民党搞假民主选举的本质。为了使这一选举丑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教育中间群众，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决定发动一个“保障人权、声援官箴予”的运动。在成都市大专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那一天，大成和同学贺新民、賈桂南另行组成突击宣传队，在市内各大影院、戏院和华华茶厅等群众集聚之处，发表讲演和散发传单。他们明知这样离开游行大队伍小组活动，目标突出而又势单力薄，最容易为特务所逮捕，但大成等却不顾安危地承担，体现了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气概。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四月初，川大十多个学生伙食团联合组成“伙食团联合会”，推选张大成等十人为代表，前去四川省政府向代理主席邓汉祥（当时，原省主席邓锡侯已去职）请愿，要求配售平价米，未果。回校后，代表团主席刘光书在全校伙食团经理大会上报告请愿经过，并提出拒绝蒋介石将派王陵基继任省政府主席的主张。当场有人反对。大成高喊道：“王灵官是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打倒王灵官！”四月九日下午，在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全市大专学校学生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冲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拨发平价米。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行

动，给刚上台三小时的刽子手王陵基当头一棒，打了他一个下马威。“王灵官”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和扣捕，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大成在此运动中积极组织和宣传鼓动，勇敢地参加了示威游行。

大成对革命同志非常关心。一九四八年秋，他从川大毕业回到郫县家里后，得知特务在川大抓人。估计有的同志在成都处境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赶来成都，把民协、民盟的陈光明、蒋国基二人接到自己家里，躲过那段时间。

原郫县民盟组织负责人之一刘仁清，一九四六年逃脱敌人追捕，通过原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到国民党军第三六五师任营长。一九四八年八月，刘任绵竹团营区第一大队大队长，暗中准备起义。同年秋，刘过成都，大成专门与他晤谈，迫切要求随刘去当兵，以便学点军事工作本领，并协助刘搞策动起义工作。刘以大成性情太爽直，不易掩护，不适宜做秘密工作，易暴露败事而婉言谢绝了。几日后，经蒋国基的姐姐介绍，大成和川大同学董絳云、张才裕、周抚群、邱蔚云、袁泽民等民盟与民协的同志去简阳县立女子中学教书，意欲在那里开辟一个革命基地，但因该校人事关系复杂，未能如愿。

一九四九年初，大成经地下党员馬锡祿、馬肅庭介绍，得识中共雅乐工委派到灌县的负责人李維实。经了解后，李維实偕馬锡祿、馬肅庭于同年三月一日去郫县德源乡张家，由二馬介绍吸收张大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日或第三日，并由李維实同志主持了入党宣誓。接着，李維实同志同意他利用其未婚妻董絳云之父董介蕃在灌县女中任教务主任的关系，偕同董絳云(不久即与董结了婚)去灌县男、女中教书。

并指示他在灌县中学设立党的联络点，接送来往于成灌线上的地下工作者。他还团结发动灌城中学的教师，创办了英语刊物和油刊小报（两期），报导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励师生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并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倒行逆施。

稍后，他还协助李维实同志到我们郫县家乡一带，在民盟成员中吸收一些够条件的人入党。大哥张文著也被接收入党了。在李维实的具体领导下，他们在郫县的德源、青龙、迴龙三个乡积极筹建地下武装，发展了有六百人枪，在温江的隆兴和涌泉两个乡，还发展了约八百人枪；一九四九年冬，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组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时，成立了以李维实为首的“岷江支队”，统率温江、郫县、崇宁、灌县的地下武装。大哥张文著是其中郫县区队和德源乡大队的负责人。后来，在安定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协助解放军平定土匪暴乱、征粮及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中，这支群众武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雅乐工委派了仁寿县的地下党员祝良安和农民骨干分子廖维正去灌县象峨煤矿工作。他们路过灌县时，去县女中会马锡禄，马不在，由大成接待。祝、廖到矿后，以拜把兄弟的方式结识了許多工人。农历八月初，二人请一驻矿士兵喝酒，借聊天启发该士兵认识共产党好处和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酒后，该士兵在寝室大声说：“国民党要完蛋了，共产党要来了，我要参加共产党”等。矿警主任得知后，当即电告国民党温江专区保安司令部，将该士兵抓去审讯，供出廖、祝二人。廖、祝被捕，又供出了大成和马锡禄等（二人在赴灌途中，曾在双流擦耳乡的中

共地下联络站住宿，在该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徐海东及该站掩护人徐茂森，也因廖、祝叛变而遭逮捕），地下党组织决定立即撤离有关人员。但大成认为，他与廖、祝无组织关系，又未谈及党内组织问题，即使他们供出与他接触的情况，也无多大关系，故未撤离。恰在这时，温江专署专员冯均逸密电灌县县长程文蔚说：崇宁县丰乐场、桂花场民主联军的起义有马锡禄、张大成等人策动，令立即逮捕。由于内部原因，灌县当局没有立即行动。第四天（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即十月十八日），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亲率特务来灌县，于中午逮捕了大成，但当即为其岳父董介蕃（国民党灌县参议会参议员）所保释。形式上是释放了，但却为特务盯住不放。大成对此异常冷静。他想，特务并未抓住证据，如果一走，反而会暴露，将对组织造成更大损失。于是，当天他仍镇定自若，下午和晚上继续在校上课。傍晚，马肃庭趁暮色去寝室看他。他不在，马留了一张暗示他迅速转移的条子。这时，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和灌县特委会秘书肖襄又找到男中校长彭玉元去学生自习室，骗出了正上辅导课的大成，并马上把他押走了。

大成被捕后，关在灌县自卫总队。他在敌特审讯中，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组织。他的爱人去看他时，他悄悄问道：“小马（马锡禄）没出事吗？”当她说都很安全时，他露出胜利的微笑。在此如此危难的环境中，大成仍然顾念其他同志的安危！

大成随即被敌特从灌县押去温江。半月后，转送到成都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监禁。在狱中，他迭遭严刑拷打。先是把他的双手反绑吊在梁上；继后又把他的双手和双脚的

拇指都吊断了，鲜血淋漓，昏死过去。当他复甦以后，还是毫不屈服，英勇斗争，沒有吐露半点资敌的材料，保护了党和民盟的组织与同志。

凶残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在覆灭前夕，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深夜，将一批坚贞不屈的獄中革命志士，绑押到通惠门外十二桥集体屠杀了。成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一月发掘出这些烈士遗体，原郫县地下武装成员肖乐贤（我们的二姐夫）、张书林（我们的堂弟）到现场去识别时，发现大成遗体缺少了右腿，口鼻还在流血。可以看出，烈士殉难时，还和刽子手们作过激烈的搏斗。他对革命一貫的英勇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母亲对于家庭有为革命如此壮烈牺牲的好儿子感到无限光荣，但因其遗体不完整，二老直到一九五九、六〇年相继去世时，仍在心中深刻疼念。大成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热忱，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貞不貳的品质以及对敌人顽强斗争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学习。

（一九八五年十月改撰）

（原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原题名是《奋发有为的革命青年张大成烈士》，现题名是编者改的）